

专题

◀ (上接7版)

一些演讲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之线索，但是找不到对应的文章。例如1912年4月9日在南通师范学校的演讲、1922年10月19日在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1925年11月8日在上海国民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另外，《制言》第25期《太炎著述目录初稿》的《讲稿》部分记载了章太炎在1932年讲《诗经大义》（潘景郑记）、1933年讲《汉字之利弊》《周易概说》《中国人种之起源》等（诸祖耿记）、1935年讲《中国古代农业之沿革》（王仲荦记），等等，这些精彩的演说只有年份、题目和记录者，内容如何，无人知晓。

2011年，独立成书的《章太炎演讲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迟迟没有进展的《章太炎全集》也等来了好消息。浙江余杭是章太炎的家乡，曾经的江南农村在改革开放后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同时催生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当地的一个领导找到章念驰，托他编一本《章太炎文集》，作为礼品用以对外交流和宣传推广。家乡有实力又有兴趣，章念驰于是提出建议，希望对方能够资助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启《章太炎全集》的整理和出版。2012年，三方就合作事宜进行了首次会谈；次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余杭区政府正式签订合作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协议。在这样的背景下，章念驰又将《章太炎演讲集》加以补充完善，加入了诸祖耿整理

出版的《太炎先生尚书说》。此外，根据马勇提供的一些在其他日记、文章中保留的演讲记录，以及编辑团队的检索所得，最终编成《演讲集》（上、下册）并归入《全集》。

“授课笔记是研究新文化运动史的重要资料，对研究历史人物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并给后学提供一个继承和创新的范例”

做《医论集》和《演讲集》时，章念驰收集了很多资料，其中包括章太炎在东京讲《说文》时由鲁迅、钱玄同等人记录的授课笔记。1903年，章太炎因为宣传革命、发表反满言论被捕。出狱后，他在同盟会的安排下东渡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开办国学讲习班。其间专门讲授《说文》，听课的学生有朱希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人。“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地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学习场景。

依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

宁的观点，授课笔记是研究太炎先生《说文》学从而研究章氏思想与学术的重要资源。“授课笔记是研究新文化运动史的重要资料，对研究历史人物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地方；同时，作为章太炎将革命与学术融为一体具体实践的范例，给后学提供了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范例。”

1986年4月，在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章念驰把鲁迅记录的2种笔记做成影印本，发给参会者用以研究参考。会后，他跟王宁的老师陆宗达说起《说文》授课笔记的复印件，希望北师大方面能够组织力量进行整理，待单独出版后再收入《章太炎全集》。1987年，陆先生因病入院治疗，次年元月逝世，未能亲自指导工作。1990年，章念驰托人将听课笔记的复印件转交给王宁，钱玄同之子钱秉雄也提供了笔记的原件以便于核对、校正。

“笔记的整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得到了鲁迅博物馆以及章念驰、钱秉雄等人的支持，王宁先后拿到8种《说文》授课笔记，分别为：朱希祖3种、鲁迅2种、钱玄同2种、许寿裳1种。许的笔记工整清晰，篇目也全，但总量少，内容简要，且与他人的记录重复，因此没有采用。余下7种，以朱的笔记最为详尽，也更忠于当时的讲解。为了保持整理者的原始工作状态，同时使记录通过相互参照与章太炎的授课最大限度地契合，王宁设想了一种特殊的体例，将手头的笔记完全按原样照录，按条目排在一起。

方案确定后，问题就来

了。“这批笔记年久类多，或缺或佚，或字迹潦草难辨，或众记不一，或字体各异，或听记有误，或语意未详。最难处是引用文献或引而未全，或误引，或出处有误，更多的则无出处，查对工作量大难度大。”武汉大学教授万献初在一篇论文中回顾了笔记整理的不易——“寒去暑来，日夜不息”。他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应老师王宁的要求分别抄录5种笔记（鲁迅2种除外），再按体例分条重抄。王宁每周一次去万献初的宿舍看稿，将7种稿子平铺，然后一条一条对起来，桌上、床上、地上都堆满了稿子。一起参与整理工作的还有2个博士，师徒三人流水作业，校了5遍。电脑字库不全，印刷难以实现，王宁便找同为陆宗达学生的梁天俊抄写书稿，他的硬笔书法好，还有扎实的国学功底，所以帮了大忙——“笔记篆隶楷夹用，繁体字、异体字以及出于分析字理的半个字很多，又经不同的人多次校对，枝条重叠，梁先生不但一一分辨，在抄写时又对照原稿，改正了不少错漏。”

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后来这本书被收入《章太炎全集》，内文和编排保持不变，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读不懂就大声地读出来，这是以前老先生教的办法。可能标的很多地方有相当之错误，毕竟我们的学问不如太炎先生”

“《章太炎全集》当年被搁置，不完全是出版的问题，而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没有人继续做下去。谁来做？谁有能力做？马勇老师救场了。”今年9月，《章太炎全集》出版研讨会的下午场，一直在认真听会的章念驰忍不住发了言，“《全集》整理工作分三类，一是整理现成的，二是需要稍加编辑的，三是重新收集文献再进行点校。比如《书信集》《太炎文录补编》都离不开大量的史料积累，否则无从下手，想做也做不了。”

听了章念驰的评价，马勇很开心，“我能参与《全集》的工作，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是与太炎先生的缘分。”

1973年，马勇去杭州当兵，次年跟着教导队到余杭训练了两个月，那是章太炎的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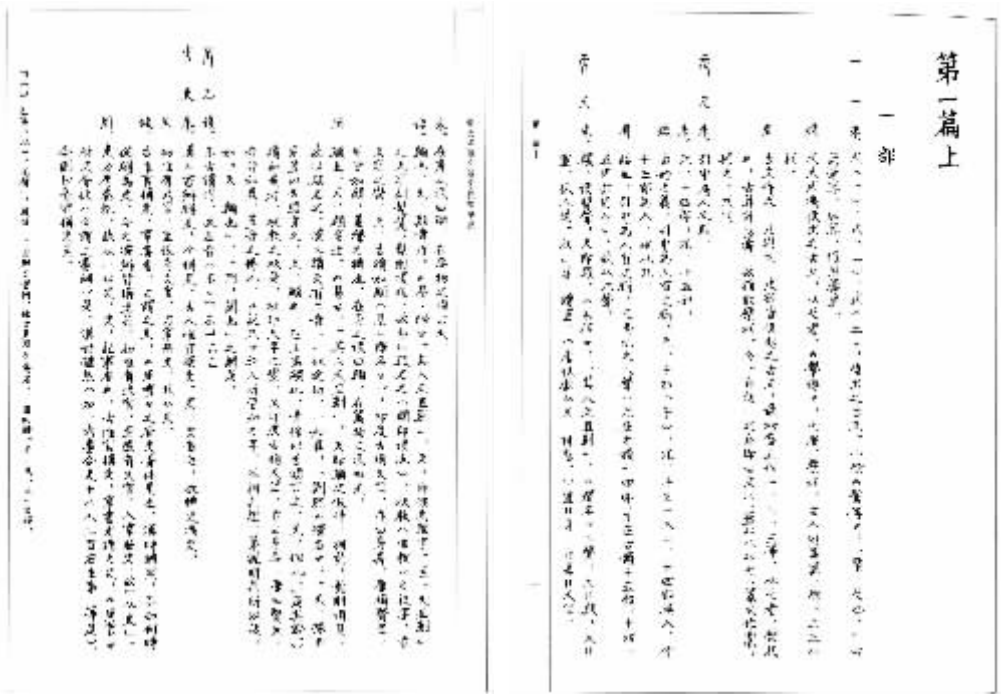
乡。凑巧的是，有个在政治部工作的同学在注释章太炎的一篇文章，“星期天休息时，就听他讲章炳麟。那时我连太炎先生的字都不认识，佩服得不得了，压根没想过有朝一日会为《全集》的出版做一点事。”

改革开放后，马勇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后来去了复旦，跟着朱维铮先生读研究生。“学校没有专门开过关于章太炎的课程，我也没有系统地阅读章太炎的作品。”马勇记得，当时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这些老师在集中精力做章太炎的研究，“我负责给朱老师送稿子、取样书，一趟趟地跑上海人民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佩服，就是不敢读。”

毕业后，马勇来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所里的图书馆藏有比较多的旧报刊杂志。“在做梁漱溟的资料整理时，有时也会发现章太炎的文章，这时就有一种亲切感。”他下意识地去复印了一份，没想到把这些留下来有什么用。评上研究员后，马勇又重新回归了读书的自由状态，而学界的一些现象对他的研究方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家在写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候都绕开了章太炎，可是在新学和旧学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关键性的人物可能还是太炎先生。”

马勇下定决心去读章太炎，一是前些年有了史料积累，二是为了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如果让我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我肯定要写太炎先生，写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从已经编完的集子——《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入手。”他看到一篇文章，一定会想办法去追溯原始的出处，要么是最早刊发的地方，要么是作者手稿的影印件。在做资料积累时，马勇的方法是由近及远——首先是梳理身边的文献资源，像《清建国别记》的本子当时就封存在社科院图书馆的库房里；接着光顾章太炎纪念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北图有规定，不让整本影印，他就一趟趟地跑，分3次拿到了《春秋左传读》）；然后是拟一份目录，托港台地区和日本的友人去复印和邮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克武、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都帮过这样的忙。

在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几乎没碰到什么困难。”让马勇感觉最耽误时间的是阅读资料，尤其是旧报刊，因为不能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朱希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人在日本期间听章太炎讲授《说文》时所作的笔记，是研究太炎先生《说文》学从而研究章氏思想与学术的重要资源。当时电脑字库不全，印刷难以实现，王宁找来梁天俊先生抄写书稿。梁先生的硬笔书法好，还有扎实的国学功底。